目　錄
CONTENTS

粵港澳社會文化

國家建構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研究述評…… 吳曉剛　劉大煒 /4
媒介敍事中的國家認同：香港報刊話語的變遷（1998—2025）
…… 胡滌非　韋洪　章夢婷 /30
從多語實踐到第三空間：澳門文化認同的建構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涵
…… 米盼盼 /69
作為一種治理機制的「授榮」
——以廣州「授榮」政策為例 …… 邵曉丹 /95

港澳經濟

區域協同與適度多元化政策對澳門「荷蘭病」的抑制
——基於澳門製造業發展的分析 …… 金縵　宋曉冬 /120

港澳政治

「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學理性建構、發展性突破與實踐性創新
…… 陳僑予 /154

港澳法律

粵港澳大灣區卓越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研究
…… 劉薇　王海洋 /178
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的實施
——一項基於特區法院判例的考察 …… 卞蘇 /208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

孵化基地如何助推政策賦能青年創業？
——基於廣佛地區案例的 fsQCA 分析 …… 吳傑　潘蕾傑　廖了 /244

粵港澳社會文化

國家建構與香港人身份認同研究述評

吳曉剛　劉大煒 *

摘　要：國家認同兼具文化歸屬與政治認同等多重維度，包含「多元一體」多層結構，是國家建構的重要一環。香港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典型樣本，是「一國兩制」下中華民族國家建構的試驗田。港人身份認同的嬗變與殖民歷史、全球化衝擊及中國崛起密切相關，典型揭示了國家認同的多維、多層結構之間的種種張力。將香港身份認同問題放在縱向歷史過程分析和宏觀視角考察中，本文認為既有研究在理論視角、研究方法、跨學科整合及政策關聯性上存在侷限，未能充分結合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遷，且對港澳台同胞國家認同建構的關注不足。未來研究需將香港問題置於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框架下，為深化「一國兩制」實踐、推進兩岸統一提供理論支撐，豐富國家建構理論。文章強調，港人國家認同的建構不僅是治理香港的關鍵，更是重構中國話語體系、實現民族復興的核心命題。

關鍵詞：國家認同　國家建構　多元一體　香港　一國兩制

*　吳曉剛，上海紐約大學御風全球社會科學講席教授、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紐約大學文理學院社會學教授；劉大煒，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上海紐約大學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2AZD1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自晚清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外部衝擊下中華民族國家重建曲折前進的歷史。這一歷史進程以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為標誌，跨越了階段性的偉大里程碑。然而恢復行使主權僅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的起點，特別是香港回歸後反覆出現的社會治理挑戰，深刻揭示出文化認同與價值共識的深層建構仍然任重道遠。這一命題不僅關乎「一國兩制」實踐的行穩致遠，更直接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塑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縱深推進。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引發國家間的競爭和國家內部的矛盾。那些通過自由貿易、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將不同國家、地區、群體連結在一起的力量，正由於人口的流動、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粹主義愈演愈烈而不斷式微。新冠肺炎疫情作為重大全球性危機，既加速了國際格局演變，也突顯了國家認同與政治信任在危機應對中的基礎性作用。[①] 在此背景下，香港作為風行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衰的典型樣本，其身份認同的嬗變具有特殊研究價值。

① 吳曉剛：《社會凝聚力建設的中國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 年 10 月 20 日，第 A8 版。

香港的發展歷程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度互構。一方面，香港是中華民族在晚清國家積弱之際，遭受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歷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二戰之後，香港順應國際政治經濟大格局的變遷，迅速完成工業化，並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進一步蛻變為全球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既是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獲益者，也深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年輕人「向上流動」乏力。2008 年發生的環球金融危機及後來外圍環境的變化，進一步對香港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問題的泛政治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諸種問題，在香港見微知著。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紛爭不斷。從 2003 年「七一」大遊行，到 2014 年持續數月的非法佔中，再到 2019 年下半年的修例風波，社會政治紛爭愈演愈烈，「港獨」思潮氾起，普通市民黃藍分明、香港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撕裂狀態，侵蝕着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①]

香港社會的分歧和撕裂，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着莫大的關係。社會紛爭的根源之一，在於大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未能順利建立起對國家的身份認同。實證數據顯示，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1997 以後曾有一段上升期，但在 2008 年以後出現轉折，開始急劇下降。[②] 特別是在 1980 年後出生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中，本土分離意識與反體制傾向加速顯化。2007 年，年輕一代還沒有表現出獨特的價值觀和政治取向；但到 2014 年以後，年輕人的國家認同下降和本土意識上升的趨勢都非常明顯。[①]

國家認同和國家建設是有機統一的關係，國家認同是近代以來國家建構的重要內容，而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是近代民族國家的立國基礎。[②] 2008 年環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崛起，2010 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化的方向發生逆轉。香港處於「東升西降」這個大變局的結構斷點上。反對派利用港人對政府無力解決民生問題的失望與不滿，煽動公眾情緒，認為只有通過所謂的「真普選」，才能真正徹底解決香港社會頑疾。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又把矛頭指向中央，挑動陸港矛盾。香港自 2008 年以後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主力均為成長於回歸後的年輕一代。他們的本土意識與國家認同開始有了明顯的張力。在後殖民地的語境下，在遭遇全球化變遷的過程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斷在西方、中國和香港本土之間進行着再建構[③]，最後演變成分離主義的香港本土論述，釀成 2019 年持續近一年的修例風波。

本文認為，只有將香港問題放在全球化潮起潮落的宏觀歷史脈絡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回歸以來特別是 2008 年後香港民情變化和針對內地與香港關係的一系列社會政治事件。2008 年的環球金融危機是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巨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出現逆轉的標誌性事件，這與香港內部的社會變化是巧合還是暗含着某種歷史的邏輯？為什麼

① Zhuoni Zhang, Peiwei Gu, "Returned but Separated: Political Stance, Identity, and the Yellow-blue Divide in Hong Kong SAR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2 (2022), pp. 131-154.

②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明報》2016 年 4 月 19 日；尹寶珊、鄭宏泰：《身份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載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Kevin Tze-wai Wong, Victor Zheng and Po-san Wan, 2016,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on Hong Kong's Local Politics: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as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Political Trust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8（Dec 2016）, pp. 1081-1104.

① 葉華：《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研究》，陳廣漢、黎熙元主編：《當代港澳研究》2016 年第 1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② 安德烈斯．魏默：《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葉江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年。

③ 黎熙元：《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 —— 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大部分港人特別是回歸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未能順利地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從歷史過程來看，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和本地認同出現哪些變化？是什麼因素和社會機制導致了這些變化？港人國家認同危機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既有研究對上述問題已經展開了一些豐富的探索，但在理論視角、方法以及政策拓展等方面仍有深入推進的空間，進一步理清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的形成脈絡及其政治、社會和心理過程，對於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意識，強化國家認同，推動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深入實踐，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的理論貢獻和政策指導意義。

二、國家建構與國家認同的形成

（一）國家認同的多維與多層結構

「國家認同」一詞，對等的英文為「national identity」，而英文中的「nation」，除了「國家」的意涵，還包括「民族」，因而英文的「國家認同」當中的「國家」兼具作為「政府」的國家（state）和作為「國族」的國家兩種意涵。「國家建構」對等的英文單詞為「nation building」，不同於「state building」。[①] 魏默認為，成功的國家建構既需要包容性的政治整合，也需要國家認同形成；二者相互依賴、共同構成國家建構的核心過程。前者涉及建設各種現代國家制度，推進跨越族群界線的包容性「權力安排」；後者則是要建立起各族群對「國族」或「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①]

身份認同（identity）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意為個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及空間上存在的過程，包括個體認同和社會認同，後者指的是人們對所屬群體的歸屬感。[②] 社會學和政治學關於社會認同的研究，大多關注與種族 / 民族群體有關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即個體對於自身與國家間關係的確認與歸屬。由於「國家」（nation）一詞包含着族群及其地理、歷史、文化等文化因素，以及主權政府及其制度、公民權利義務等政治因素，「國家認同」也包含多維、多層的意義結構。

就「國家」（nation）的「族群」意涵，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就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國家建構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概念。[③] 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即中華民族的「族群」包含兩個層次，中華民族的「一體」層與「五十多個民族」的「多元」層。這一概念提出了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族群」的多層結構及其整合的問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學者對這一概念展開了廣泛而持續的討論，從不同學科視角不斷豐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內涵，使之成為理解中華民族國家建構的主要範

① Juan J. Linz.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n Review* , vol. 1, Issue 4 (October 1993), pp. 355-369.

① 安德烈斯．魏默：《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葉江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年。
②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no. 1(1982), pp. 1-39.
③ 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式之一。[①] 後來學者亦指出，作為「國族」概念的國家遠不止兩層次的結構，而可能是三層、四層乃至多層次的結構。[②] 國際學界對於「國家」作為族群的多層次結構，則使用「nation」和「ethnic group」這兩個概念予以區分，即「nation」這一概念通常用於指稱更高層次的基於國家主權、制度層面予以統合的政治共同體，而「ethnic group」則用以指稱較低層次的基於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自然形成的群體。後者通常與地域緊密結合，由於兩者層次的差別，又形成了中央與地方或中央與邊陲之間的複雜關係。這種中央—地方關係，同樣對國家認同的建構形成複雜的互動關係。

就「國家」所涉及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不同面向而言，「國家認同」同樣包含眾多面向，或不同維度。[①] 正是對這些不同面向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兩大類型的國家認同觀。第一類以查爾斯·泰勒為代表，強調群體的文化歸屬和共善（common good）導向，公共利益優先於個人權利。[④] 換言之，在國家認同當中文化認同的比重應大於政治認同。另一類以哈貝馬斯為代表，強調尊重個體自主性以及多元差異，認為個體對國家的認同來源於構成國家的

① 馬戎：《重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新的歷史條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4 期；葉江：《多民族國家的三種類型及其國家認同建構問題民族學研究的視角》，《民族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何叔濤：《漢語「民族」概念的特點與中國民族研究的話語權》，《民族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① 林尚立：《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8 期；王卓君、何華玲：《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危機與重構》，《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周光輝、劉向東：《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及治理》，《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認同視域下的政治認同》，《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門洪華：《兩個大局視角下的中國國家認同變遷（1982—2012 年）》，《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14 年第 2 期；周光輝、李虎：《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構建一種更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 7 期。

④ Charles Taylor, *Reconciling the Solitudes: Essays on Canadian 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 Montreal &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政治經濟制度能否保障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實現，亦即國家制度才是國民認同的基礎，因此「政治認同」被視作國家認同的主要面向。[①] 兩種國家認同觀在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文化特殊性還是多樣性、國家角色等問題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別。兩者各有利弊，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兩者構成國家認同的一體兩面，一虛一實，互為表裏，對於任何一方面的偏頗，都可能走向極端，產生不良的社會後果。

（二）國家認同與國家建構

從各國的歷史經驗來看，身份認同通常不是一個問題。受社會文化、歷史因素和政治體制的影響，[②] 個人的國家認同通過社會化過程在青少年時期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一般保持不變。只有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不同群體接觸和衝突顯著增加時，認同問題，即「我是誰」的問題，才會重新呈現出來。[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後，不少地區之間的衝突是在民族國家之間和多民族國家內部發生的，背後都存在深層的身份認同問題。[④] 身份認同在社會運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具有很強集體認同感的群體更有可能組織起來，為

① 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raxis International*, vol. 12, no. 1 (1992), pp. 1-19.

② Jeffrey T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1999), pp. 83-114; Taras Kuzio, "National Identity in Independent Ukraine: An Identity in Transi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 no. 4(1996), pp. 582-608. Susan Bickford, "Reconfiguring Pluralism: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Inegalitarian Po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1(1999), pp. 86-108.

③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④ 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1(2005), pp. 47-74.

達成特定目標而發起一場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集體身份認同也並非給定而不變的，而是在社會動員的過程中被解構、重新建構、甚至被想像（imagined）出來的。[①] 集體行動可能會進一步強化群體認同，從而使社會和政治衝突長期延續下去。在許多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身份認同的重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具有反諷意義的是，1989 年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來也意識到，即便在當今所謂的西方民主社會，身份認同已成了最易產生分歧和對立的根源。[③] 雖然身份認同是對不公平社會現象的必然和自然反應，但是不能以特定方式對身份進行詮釋或維護而代替對一些重要社會問題的嚴肅和理性的思考。當身份成了政治過程的基本主體時，如何整合身份認同問題，形成社會團結和共識，增強社會凝聚力，是當下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西方社會也需要迫切面對的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威默從更加宏觀的比較歷史角度，進一步發展了國家建構理論。[④] 他在《國家建構》一書中，一開始就把民主作為制度因素排除在了其「國家建構」理論之外：「如果公民通過權威和擁護的關係與政府相互連接，那麼就會出現一個包容性的國家共同體，國家建構由此可被認為獲得了成功。我認為，這種聯繫是通過民主選舉還是通過其他政治機構產生，並非應該關注的問題。相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 1983.

② Susan J. Henders, *Democratization and Identity: Regimes and Ethnic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4.

③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④ 安德烈斯·魏默：《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葉江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年。

反，不是所有的民主制都能成功地建立一個整合的國家。他提出以公民與國家間「關係」作為「國家建構」的出發點，通過 3 對 6 個國家的比較案例和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成功的國家認同建構應關注三個維度的問題，即由志願性組織形成的跨族群共同體和地區聯盟、國家與公民之間資源交換機制、建立政治聯盟的溝通機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威默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分析中國人強烈的「民族認同」，認為它與中國的中央集權與核心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密切相關；國民能通過統一的語言文字成功進行有效的交流整合。他特別強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能力，在建構國民認同意識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潮和不平等的惡化，使得西方社會和政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發達國家內的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思潮亦開始愈演愈烈，也引起學者們更多的關注。[①] 伯尼考斯基指出，當代社會科學對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的研究，近年來已從一個純粹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的項目，逐漸變成一個涵蓋認知、情感和社會日常互動等更廣泛的議題。認同建構不能光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而要與廣大民眾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如何理解周圍世界和進行社會互動聯繫起來。[②] 有學者從群體競爭關係的角度，研究族群內在認同的形成和強化，認為一個以往佔優勢群體面對外來群體帶來的地位威脅，會收縮其群體定義界限，使成員更加同質化，並

① Jaak Billiet, Bart Maddens and Roeland Beert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Attitude toward Foreigners in a Multinational State: A Replic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 no. 2(2000), pp. 241-257.

② Bart Bonikowski, "Nationalism in Settle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2(2016), pp. 427-449.

強化價值認同。[①] 這一發現說明，群體接觸並不一定能增強認同與合作，族群認同包含很多複雜的社會心理過程。[②] 儘管表現形式不同，美利堅民族主義的興起似乎也是不爭的事實。伯尼考斯基和迪馬喬利用社會調查數據，發現美國社會存在的四種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他們對少數族裔、移民和國家主權的態度，均有明顯的差異。但是重大事件如恐怖主義襲擊、戰爭、經濟危機和政治紛爭會強化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③]

全球化所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同樣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④] 不少學者也從建構理論的視角，從治理或制度建設、民族文化、國際軟實力、領土認同等不同的角度提出強化國家認同的路徑或方法。[⑤] 與國外文獻注重實證研究不同，李春玲、劉森林的文獻是國內少有利用大規模社會調查數據（2013 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研究國家認同的文獻，初步分析了中國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及其代際特徵差異。[⑥]

① Maria Abascal. Contraction as a Response to Group Threat: Demographic Decline and Whites'Classification of People Who Are Ambiguously Whi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5, no. 2(2020), pp. 298-322.

② Marilynn B Brewer and Wendi Gardner.Who Is This 'We' ?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1, no. 1(1996), pp. 83-93.

③ Bart Bonikowski and Paul DiMaggio, "Varieties of American Popular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1, no. 5(2016), pp. 949-980.

④ 金太軍、姚虎 :《國家認同 : 全球化視野下的結構性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6 期。

⑤ 林尚立 :《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8 期；王卓君、何華玲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危機與重構》,《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周光輝、劉向東 :《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及治理》,《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詹小美、王仕民 :《文化認同視域下的政治認同》，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9 期；門洪華 :《兩個大局視角下的中國國家認同變遷（1982—2012）》,《中國社會科學》2014 年第 2 期；周光輝、李虎 :《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 —— 構建一種更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 7 期。

⑥ 李春玲、劉森林 :《國家認同的影響因素及其代際特徵差異 —— 基於 2013 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4 期。

三、「一國兩制」下香港同胞的身份認同

香港回歸中國後在「一國兩制」下的經歷和最近幾年的社會政治動盪，可以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一個獨特的案例，來研究認同、社會運動、民族主義之間複雜動態的關係。討論香港本土意識和香港人身份認同，離不開三大關鍵因素，即英國殖民統治、中國以及與內地隔絕的香港。三者與「國家認同」的多維、多層結構，以及「一國兩制」之間的張力，構成理解和認識香港同胞身份認同的複雜面向的基本框架。

（一）香港本地身份認同的建構，揮之不去的殖民陰影

香港成功故事的不同建構。作為英國殖民統治的東方之珠，香港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都是來自中國內地的難民聚集地，一直被稱為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①] 二戰之後，香港在 1950—1970 年代從一個轉口貿易港，迅速完成工業化，並在 1980—1990 年代進一步蛻變為全球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經濟奇跡，根據官方的論述，應當歸功於「香港精神」，即廣為傳頌的「獅子山下」的成功故事，與殖民地歷史和港英統治無關。香港人生於憂患，但憑藉吃苦耐勞、守望相助，終能克服困難，使香港發展成為今天璀璨的「東方明珠」。[②] 然而，港英殖民統治最大的奇跡，不是經濟繁榮，而是政治出奇地穩定。香港本地學者對香港人的精神特質做了進一步的闡述。金耀

① Mathews, Gordon,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2008.

② 呂大樂 :《唔該，埋單》，香港：閒人行有限公司，1997 年。

基從政治層面進行分析，認為是港英政府採取「行政吸納政治」的管治模式的結果，通過「吸納」殖民政府認可的華人精英參與社會「共治」，讓「上等華人」分享部分權力，同時通過「諮詢式」民主吸納基層民意，從而達至管治的穩定。[①] 劉兆佳（Lau，1982）提出了「功利家庭主義」的觀念，認為戰後香港社會主要呈現「華人社會」和「難民社會」的特點。[②] 信奉儒家哲學的華人社會盛產順民，飽受戰亂、政治運動之苦的難民身份則讓他們更加厭惡政治，抱着「客居」心態。香港經濟繁榮，吸納了大量的社會不滿，紓解了社會矛盾，也造成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淡。另一方面，港英殖民政府卻建構了另外一套「香港的成功故事」，認為基於英國政治價值觀的管治制度所建立的價值觀成為香港成功的基礎，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而事實上，這些從來就不是香港人的理所當然，甚至可說是港英政府在過渡期政改「躍進」的結果。[③]

也有學者則從階級分析、殖民主義等理論視角，對金耀基塑造的「冷漠的中國人」和劉兆佳塑造的「聽話的中國人」形象提出質疑。[④] 當時在港的中國人亦並非如金、劉描述的那般冷漠和順從，六十年代中期的「九龍騷動」和「1967 年反英抗暴運動」，以及後來的學運，則可以看出當時民眾的不滿情緒。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隨着經濟發展，社會環境改變，社會階級流動開放，「香港變成了一處人人有機會的地方」，民意才逐漸出現轉向。[①]「1967 年反英抗暴運動」之後，港英政府在政治高壓的同時。通過發展經濟和實行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創造了所謂的「麥理浩黃金十年」。相對於當時中國內地的內亂和貧困，香港提供了富足、安定和繁榮的生活，加上與內地長期的隔絕，香港市民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特別在戰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開始認同「以香港作為家」，逐漸建立起了一種新的本地認同。[②]

「麥理浩黃金十年」本質上還是一套殖民統治邏輯，雖然很多時候殖民政府處理得不着痕跡。而當涉及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時候，這套殖民地邏輯更顯得技巧高超。[③] 由於大部分港人仍刻意與港英殖民政府保持距離，抱着一種「疏離感」的方式生活，市民認同（civic identity）相容於對中國人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形成了港人獨特的雙重認同。[④]

（二）港人身份認同中的「中國」——「文化之根」與「他者」

回歸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其中關鍵因素是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因素」是一個複雜混合體，涉及政治、文化、歷史、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絕不是單一面向。即使是戰后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中國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也難以割捨。在許多港人心目中，中國

① 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發展模式》，載金耀基、邢慕寰編：《香港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年。
② Siu-kai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
④ 羅永生：《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

①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
②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③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④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

是作為「文化上的中國」而非「政治上的中國」。[①] 不可否認，戰後相當一部分移民因意識形態恐懼，以「難民」身份逃到香港，「遺民」、「難民」和「移民」的心態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這種意識形態恐懼成為最現實、最壓倒性的「中國因素」。港英殖民政府正是利用民眾的這種心理，不着痕跡地「塑造」香港人的意識形態。[②] 後來的研究顯示，香港同胞中有難民經歷的確實對建制派的支持度更低，其對「中國」的認同度也更低。[③]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環境的改善，以及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面對一批內地新來港的移民，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藉助一個非本土的「他者」，把「中國因素」作為參照面，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和大眾文化，塑造出「香港與內地對立的二元結構」，由此建立起身份認同 —— 香港人是優越的「自我」，內地則是一個落後的「他者」；香港是「現代化大都會」，內地則是「落後鄉村」；香港是「自由世界」，內地則是「威權統治」。[④] 這種二元對立關係，亦隨着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建構。正如安德森（Anderson）指出，即使是在一個很小的社會，人們也無法認識大部分成員，在每個成員當中，都有自己所屬群體的圖像，他們透過想像，建構出自己所屬的共同體。在這種建構的過程當中，語言和印刷品，起着關鍵作

① Helen F, Siu.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uth China," *Dedalus,* vol. 122, no. 2(1993 Spring), pp. 19-43.

② Siu-kai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Zhuoni Zhang and Han Zha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Hong Kong,"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1, no. 4(1993), pp. 95-117.

④ 谷淑美：《文化，身份與政治》，載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用。民族和國家是現代性的產物，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①] 港人這種身份認同的困境在 1980 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未來談判期間尤其明顯，港人的文化歸屬與政治認同、地方意識與國家觀念之間的複雜心理，體現在身份認同上則是某種疏離，學者們對港人這種身份困境，構建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如「二分法」（香港人、中國人）、「三分法」（在二分法上加入「混合認同」）、「四分法」（將混合認同依偏向進一步拆分為偏香港人或偏中國人）乃至「評分法」的分析框架。[②] 這些分析框架，試圖整合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二元劃分以及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的多層結構關係。

（三）港人雙重身份認同的危機 —— 多維與多層格局的激化

1997 年香港完成了政治主權上的恢復，然而 20 年來人心依舊未歸。港人國家認同較弱的狀況沒有改變。[③] 而在「一國兩制」的體制安排下，任何加強港人國民教育措施的推行都困難重重。來自香港兩所大學的相關調查數據均顯示，港人在回歸之後，國家認同感曾一度有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 1983.

② 此類分析框架被廣泛引用於香港的社會調查中，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媒與民意調查中心對港人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曾採用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香港科技大學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開展的「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則主要採用評分法。

③ 黎熙元：《全球性、民族性與本土性 —— 香港學術界的後殖民批評與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再建構》，《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閻小駿：《香港治與亂 —— 2047 的政治想像》，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所上升，[①] 但是這種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的認同感，被麥高登、馬傑偉和呂大樂稱為基於市場的國家認同（market-based identity），[②] 是以一種不穩定的、根據具體情境定義的機會主義的認同。以 2008 年為轉折點，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於北京奧運會時達到最高，但從自由行擴大起開始下跌，在 1980 年以後受教育和成長與回歸之後的年輕一代表現尤為突出。[③] 黃子為等利用香港中文大學 1998—2017 年的調查資料，分析香港本土和國家意識的消長，發現時期和世代對本土意識的強化都有影響。內地遊客的湧入，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可以部分解釋本土認同崛起和國家認同的下降。他們還發現，2007 年之後逐漸擴大的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降低了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④] 針對香港學生的研究中發現，普通話教育、內地夏令營等都會對他們的國家認同產生積極影響。[⑤] 香港與內地的交往日益密切，而來往兩地頻繁的香港人國家認同也會更高。[⑥]

2008 年發生的環球金融危機及後來外圍環境的變化，對香港內部貧富分化問題的進一步政治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民幣大幅度升值，2010 年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越來越多的內地人開始

①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明報新聞網，2016 年 4 月 19 日；Kevin Tze-Wai Wong, Victor Zheng, and Po-shan Wan 2020. "Local versus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1998-2017,"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51, no. 5(2020), pp. 803-82.

② Gordon Mathews, Eric Ki-wai Ma, Tak-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③ 趙永佳：《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明報新聞網，2016 年 4 月 19 日。

④ Kevin Tze-wai Wong, Victor Zheng, and Po-shan Wan,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on Hong Kong's Local Politics: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as a Double-edged Sword for Political Trust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8(December 2016), pp. 1081-1104

⑤ 岳珍珠、李多：《論香港人的社會認同及影響因素》，《當代港澳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⑥ 鄭婉卿：《香港青年的生活滿意度、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青年探索》2019 年第 1 期；鄭婉卿、黎熙元：《身份的迷思：香港居民多元認同辨析》，《當代港澳研究》2017 年第 1 期。

到香港學習和工作。珠三角成功轉型和經濟總量增長使港人失去了原來的優勢地位。全球化的方向發生了逆轉，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需要直面上升中的中國認同的挑戰。年輕一代不斷以「集體回憶」重構身份認同，緬懷殖民時代的「美好時光」（如 2007 年保衛皇后碼頭），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內地影響的社會運動，如 2010 年的反高鐵運動，2011—2012 年反「雙非」、2012 年反國民教育，2013 年反水貨客遊行等，本土認同得到不斷強化。[①] 香港本土論述開始抬頭，「城邦論」、「遺民論」、「香港民族論」等開始從理論上為本土主義甚至分離主義提供支撐。伴隨着這個轉折點的是香港內部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和住房問題，以及與中央政府就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博弈，導致 2014 年非法「佔中」事件的發生以及激進本土意識的氾起，釀成 2019 年修例風波引起的社會動盪，而港人的國家認同亦創歷史新低。[②]

學者們試圖解釋 2008 年後本地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對立消長關係。[③] 第一是政改不順。面對回歸後的大幅經濟衰退，特區政府施政不善及基本法 23 條立法等，香港 2003 年爆發「七一」大遊行，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普選的呼聲高漲。在選舉制度改革問題爭議與中央博弈的過程中，香港的年輕人的政治立場日益激進，政治立場極端化。在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中，港人的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也不斷強化，導致國家認同的下降，在「一國兩制」的政制框架下，兩者與政

① 魏南枝：《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與走向》，《中國青年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② Sebastian Veg，"The Rise of 'Localism' and Civic Identity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0（2017），pp. 323-347.

③ 郝詩楠：《香港人的國家認同與展望：基於港台海外學術成果的分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1 期。

治認同相互重構，形成二元對立格局。[①] 第二是民生維艱。1990 年代香港經濟轉型不順，經濟增長減慢。全球化下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房價高居不下，年輕人向上社會流動困難。[②] 這種變化趨勢幾乎與回歸同步發生，港人很容易將經濟上的失落與政治上的轉變進行關聯，進而歸咎於回歸及特區政府。[③]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民眾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提升，與香港市民的體驗形成強烈反差，經濟上的失落感，使香港青年看不到內地發展的成果，又無限放大內地的問題，這種對中國的「重新想像」，造成了香港青年對國家身份認同的負面評價。[④] 一些民生訴求未能實現，部分香港民眾歸咎於中央，在衝突過程中更加強化作為香港人本地身份的認同。[⑤] 最後，通識教育和社交網絡等電子媒體，對香港塑造年輕一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造成很大的影響。[⑥] 媒體對於內地議題和本地社會運動的報道方式同樣會影響年輕人的中國身份認同。[⑦] 國家認同較弱的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信任也會較低。這種影響在 2012 年後才顯著地發生作用。[⑧]

① Zhuoni Zhang and Han Zha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Hong Kong,"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1, no. 4(1993), pp. 95-117.
②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
③ 馬岳，《後工業年代的香港政治價值》，《二十一世紀評論》2011 年 12 月號。
④ 尹寶珊、鄭宏泰：《身份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載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香港：中華書局，2016 年。
⑤ 馮慶想、賴付軍、徐海波：《經濟、民生、政策對香港居民國家認同的影響 —— 基於回歸模型的分析》，《系統科學學報》2019 年第 4 期。
⑥ 趙永佳、阮筠宜、梁懿剛：《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港澳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⑦ 陳薇：《香港身份認同的媒體建構：社會建構論的視角》，《港澳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⑧ 王衡：《國家認同、民主觀念與政治信任：基於香港的實證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 年第 3 期；Zhuoni Zhang and Han Zha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s in Hong Kong,"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1, no. 4(1993), pp. 95-117.

四、進一步推進「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建構研究

（一）既有研究述評

國家認同在香港不僅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而且還是解釋香港很多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上所述，認同問題近年來開始受到學術界和政策界越來越多地關注。然而，對香港的研究大多從問題出發，停留在描述趨勢的層次，綜合性、系統深入的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缺乏理論視角與特定場景的結合。一方面，如上所述，冷戰結束後不少民族國家之間和多民族國家內部的衝突，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潮和不平等的惡化，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思潮亦開始愈演愈烈，社會科學研究開始重拾對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的研究興趣，但這些研究已超越了以往去殖民化、民主化的理論框架。然而，國家之間比較歷史研究和國家內部不同族群的認同建構通常只能處理單個維度的認同問題。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提供了一個民族（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政治體制下地方認同與國家認同相互重構的獨特案例。另一方面，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的學者，關於港人身份認同的研究，大多是從香港本地歷史的出發，描述本土意識的建構過程，有意無意地借用後殖民主義、西方政治民主化、現代化或後現代、後工業主義等話語，缺乏國家建構的理論高度和宏觀歷史視野。

其次是缺乏跨越不同學科、不同研究議題的整合。關於身份認同和民族主義研究，傳統上是歷史學和政治學的領域，對影響身份認

同構建的因素分析缺乏綜合性和系統性，如有從社會運動的角度、社交媒體的角度、社會流動的角度、通識教育的角度等來研究港人的身份認同，在一定程度上顯得支離破碎，無法整體把握國家認同構建的動力學。近年來認同研究已經逐漸變成一個涵蓋認知、情感和社會日常互動等更廣泛的議題。認同建構不能光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而要與廣大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如何理解周圍世界和進行社會互動聯繫起來。需要對群體間的不平等，群體間競爭互動關係及其主觀後果產生的社會心理過程進行整合研究，才能理解認同形成的機制。

第三是未能對造成港人認同危機的外圍環境變化予以足夠的關注。肇始於 20 世紀六七十年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浪潮，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已徐徐拉下帷幕。香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工業化和經濟轉型，既深受全球化之利，也承受全球化帶的負面後果。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潮和不平等的惡化，使西方社會和政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導致歐美右翼民族主義的崛起和反移民浪潮的興起。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和影響力開始崛起，全球化方向發生逆轉。香港的知識精英未能對香港在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局之中的定位有清晰的把握，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依照慣性簡單的界定為威權與民主，一國與兩制間的張力和矛盾，未能探究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如何引發香港這個開放經濟體的內部問題，導致本土意識的崛起和國家認同的式微。

第四是缺乏嚴謹的實證數據和複雜的測量。社會科學關於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基於文本分析和定性描述，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研究通常使用和引用的調查數據，一是來源於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自回歸以後每年連續的電話抽樣調查，另外一個是來源於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 年獨立為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市民的身份認同電話調查。這些重複性電話抽樣調查雖然能夠描述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趨勢，但是因為電話調查樣本量小，所包括的問題簡單，無法深入分析身份認同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別（除了基本的人口學變量之外，如在什麼類型的學校受的教育；教學語言是什麼；父母一代是否是移民等），也無法揭示趨勢變化的原因和機制。此外，身份認同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並非存在一個直截了當、沒有異議的測量。例如，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美國存在着四種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所獲得的結果可能取決於所採用的測量工具。最後，調查時有些回答，比如持有很強的香港本土認同而否定國家認同，因為政治正確或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研究者得不到真實的信息，使調查數據產生誤差。

最後是有關港人身份認同研究的政策意義不太明確。由於缺乏扎實的數據分析和對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測量，現有調查數據很難知道有些人的本土意識 / 國家認同是因為外在的重大事件而改變，還是因為這些變化來自不同的群體，隨着時間的變化，受調查的樣本或許都發生了改變。為了找到變化的原因以及國家認同如何與其他社會事件（例如社會運動）互動和影響，需要不同於重複抽樣調查數據的家庭和個人層面的追蹤調查數據，針對同組人的認同的連續性測量，結合其他多來源數據和實驗設計，找到認同變化的真正原因，以便實施適當的政策干預，促進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的成長。

（二）推進「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建構研究

開展「一國兩制」下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意識的研究，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學術價值，更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應用價值。

首先，應結合港澳地區的社會治理，促進「一國兩制」下港澳地區人心的真正回歸。自 2008 年以來，香港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社會動盪，最終釀成 2019 年 6 月初開始、延續半年多的修例風波，最終演變成為激烈的警民衝突和暴力打、砸、搶事件，成為自「六七反英抗暴運動」後 52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動盪。這次危機，可以視為回歸以來香港長期積累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的爆發，也暴露港人國家認同意識建構缺失的嚴重後果。2020 年 6 月 30 日《港區國安法》的通過和實施，對恢復社會秩序，促進香港由亂及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解決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疏解民怨，贏回民心，加強認同和國家意識，才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道。正如香港「1967 年反英抗暴運動」平息後，港英政府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開啟了麥理浩「黃金十年」的各項改革，創造了香港人的本地歸屬感。後國安法時代，如何實施香港同胞的人心回歸，是一項「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還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國家認同。如果說「一國」是「兩制」的法律基礎和政治前提，而國家認同則是將「一國」和「兩制」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劑。

其次，應整合現代國家建構理論，將中國元素注入國際理論界，形成理論整合。社會科學關於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大量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國與國之間，或國內不同族裔間的矛盾和衝突，而沒有分析過一個民族在「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下的身份認同變遷與結構過程。來自香港的經驗（以及教訓）可以豐富和修正以西方經驗為主的現代國家建構理論。而由於歷史的原因，港澳居民的國家認同意識從來都不是給定的、不變的。兩制下的地方認同意識和國家認同意識在特定地歷史背景下可以被不斷地解構和重新結構，在矛盾衝突中發展。「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國家認同研究，將進一步豐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為現代國家建構理論開闢新的理論生長點。

第三，應整合參考台灣同胞的身份認同研究，推進海峽兩岸的國家認同建設。「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在於妥善解決台灣問題。由於歷史原因，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台灣和香港形成了緊密的聯繫，兩者同為內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在人員構成、文化淵源、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流行文化等方面趨同，在兩者同時與內地隔絕的情況下，雙方互動頻繁，在上世紀下半葉的國際國內語境中，兩者幾乎連成一體，「港台」並稱，形成了獨特的「港台文化」現象。由於類似的原因，台灣同胞同樣面臨嚴重的身份認同問題。近年來，隨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東西對峙和衝突加劇，兩岸關係由趨向統合轉為走向隔絕，台灣本土意識崛起，去中國化的趨勢明顯，以「中國」作為他者建構「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日益高漲。如果說早期島內同胞仍然與大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仍然認同自己為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正朔之所在，新一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已逐漸與中華民族的文化聯繫「切割」，而以所謂「台灣民族」自居。台灣同胞身份認同的發展歷程，與香港同胞極為類似，其本土意識崛起亦與香港的本土派遙相呼應、互相借鑒。因而，研究「一國兩制」下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也要關注台灣同胞的身份認同，加深彼此的理解，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家認同建設。

第四，應整合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致力於建立面向國際社會的話語體系。中國式現代化，意味着以中國文化傳統及經過中國人民百年來艱苦奮鬥的現代化實踐所檢驗的價值，接引起源於西方社會的現代價值。這些現代價值雖肇始於西方，但更是世界各國人民和聖哲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乃至犧牲所爭取而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共享的核心價值。從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理論出發，將「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同胞回歸、國家認同的重建，與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整合，放在中國崛起和全球化歷史變遷背景下來考察，超越以往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民主與威權、傳統與現代等二元對立理論框架和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有助於建立關於中國式現代化面向國際社會的中國話語體系。

Review on Nation Building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Hong Kong

Wu Xiaogang, Liu Dawei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a cornerstone of nation-building, is recognized as multi-dimensional (cultural, political, etc.) and multi-layered (diversity in unity) in China. Hong Kong, a paradigmatic case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nd for Chinese nation-state building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xemplifies the complex interplay and tensions within China's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ayered structure. Hong Kong people's evolving identity over the past decades has been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city's colonial history,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is review critically analyzes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revealing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olicy relevance. The literature often fails to adequately contextualize Hong Kong within shifting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and it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ompatriot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Moving forwar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osition Hong Kong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to deepe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actice, advanc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and enrich nation-building theory. This review underscores that national identity is not only essential for healing social divisions in Hong Kong but also crucial for reconstructing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 Building; Diversity in Unity;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責任編輯：葉華）